

新四军老八团中的“四大金刚”

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新四军中,女兵属于较特殊的群体。由于出色的工作,她们深受战友们和群众的爱戴,往往被称为“军中花木兰”。然而在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中,却有4名女兵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四大金刚”,这是怎么回事呢?



新四军部队向敌后挺进。

“四大金刚”雅号的由来

说起“四大金刚”雅号,就得先说说新四军“老八团”。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新四军开始组建,一大批进步青年加入各支队、团的服务团,不久又被合并进入全军的服务团,因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女同志,于是新四军中有了女兵。

1937年底,根据中共中央和长江局指示,战斗在桐柏山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周骏鸣任团长。1937底至1938年春,八团正在豫南一带整军训练、扩充队伍,经北平和河南省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推荐,杨寒、樊西曼、唐觉民、王典训4名女同志先后来到这支部队参军,被分配在团政治处工作。

入伍后,4名女同志剪去长发,穿上粗布军装,戴上军帽,打起绑腿,扎起皮带,远远望去,与男战士毫无区别。4名年纪不大的女战士,在老八团这个革命大熔炉中,从不矫揉造作,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豫南整训期间,她们不讲特殊,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拥挤的民房,地方铺稻草当床,盖的是单薄的军毯,和男战友别无二致。

1937年12月,豫西南地主武装在得知老八团主力外出的消息后,对团部所在地焦作园发动突然袭击,企图一举消灭留守人员。危急时刻,4名女战士和团部其他同志一道,拿起武器,沉着冷静地和敌人展开激烈的斗争。战斗结束后,团首长对4名女战士提出了表扬,战友们也对她们战斗中的英勇表现钦佩不已,后来,有人半开玩笑地称4名女战士为部队的“四大金刚”。不久,这个叫法便在部队里流传开来。

1938年2月,根据上级指示,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集中于确山县竹沟进行整训,为东进抗日做准备。杨寒、樊西曼、唐觉民、王典训一面积极参加军事训练,一面分头到基层连队教唱抗战歌曲,并走上街头,举办军民联欢会,为群众演出活报剧,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把竹沟一带的抗日动员活动搞得热火朝天。

1938年四五月间,老八团进抵皖中舒城、庐江、巢湖一带。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部队成立了战地服务团,由樊西曼(23岁)担任团长。服务团的任务繁重,除了随时准备参加战斗外,还要组织民工输送伤病员,在战地、驻地开展民运、宣传工作,动员民众积极支持新四军。

在新四军首战蒋家河口战斗胜利后不久,几位女兵再次接受了抗日战火的洗礼。1938年6月,八团在大关、小关之间设伏打击敌人。当时,已占据合肥、徐州的日军,集结重兵由皖中向大别山进攻,八团决定在桐城至舒城间的大关、小关之间的公路沿线设伏,以6连担任

初入皖东后,对敌斗争越发艰苦,4名女战士和服务团依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战斗。她们走村串巷,到老乡家里走访、调查,在街头、集镇组织军民联欢会,演活报剧、话剧,唱抗日歌曲,动员地方民众支持抗战。她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打鬼子去》等活报剧,深受群众的欢迎。

通过4名女兵和服务团卓有

3月8日,八团在邢集举行誓师大会后,便踏上东进抗日的征程。从豫南到皖西、皖中,漫漫征程五六百里,途经大别山,行军艰辛。4名女战士与其他战友一样,背着背包、米袋,一路跋山涉水,从不叫苦。由于长途艰苦行军,她们的脚底都走出了成串的血泡,疼痛不已。但她们从不叫苦,并相约不告诉领导和战友,用针挑破血泡、简单包扎后继

主攻,其他部队担任掩护、支援任务。次日上午,当日军运输队进入伏击圈时,6连战士们开枪射击,并很快发起冲锋,一些没有枪械的战士挥舞着大刀、红缨枪也勇敢地冲进战场。这次战斗,击毙日寇10余人,俘虏1人,我方伤亡5人。王文山排在激战中英勇牺牲。战斗结束后,樊西曼强忍悲痛,和战友们将烈士的遗体抬下战场,整理好遗容安葬。

1938年秋,根据上级指示,老八团越过淮南铁路进军皖东。10月,八团在巢县夏阁镇袭击日军小队,和敌人进行白刃战。战斗取得了胜利,但特务连连长褚学忠、战士赵银

成效的工作,皖东民众很快被动员起来,以各种形式支援新四军抗战,皖东地区很快掀起了抗日高潮。

1939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发展华中”“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以八团为基础,组建新四军第五支队。五支队在罗炳辉司令员的率领下,继续东进,在津浦铁路两侧开展游击活动,着手创建皖东(淮

续工作。

团领导见4名女兵过于辛苦,就有意分配她们跟随后卫部队一道行军。她们刚一加入后卫部队,就主动承担起各项收容工作,热心照顾伤病员、寻找掉队战友。到了宿营地,几个姑娘不及休息,立即开展群众工作,并进行社会调查。部队出发时,她们便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处理遗留问题。

多壮烈牺牲。当天下午,4名女战士为烈士整理遗容,并参加了烈士追悼会。追悼会上,4名女战士手持纸扎的白花,唱着“安眠吧,勇士”的悼歌,和全团指战员共同缅怀亲爱的战友。

1939年春节初一,日伪从合肥、巢县调集800余兵力,突袭八团团部驻地东山口、方老人洼一带。八团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凭借地势奋勇反击,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4名女战士和战友们共同战斗在第一线,和医护人员救死扶伤,并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宣传鼓动,为战友们鼓劲,4名女战士和服务团的形象也越发为群众所喜爱。

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樊西曼、杨寒、唐觉民、王典训4名女战士接受了新的任务,被分派到路西地区的定远、滁县、和含,组织起多个精干的民运组,积极发展地方党组织,动员广大群众,成立青抗、农抗、儿童团等群众性组织团体,为巩固根据地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据《人民政协报》)

读史忆人 典故

“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

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内,一块一米高的花岗岩石矗立在墓前,正面刻着“毛岸英烈士之墓”;背面刻着:“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

毛岸英,1922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幼年随父母辗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1930年10月,母亲杨开慧被捕入狱,毛岸英也被关进牢房。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被营救出狱,并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上海。1931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毛岸英流浪街头,在烧饼铺当过学徒,捡过破烂,卖过报纸,推过人力车,历尽艰辛。1936年,中共地下组织安排毛岸英去苏联学习。在苏联期间,他开始在军政学校和军事学院学习,后来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

1946年,毛岸英来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遵照毛泽东“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的要求,毛岸英和农民睡一样的土炕,吃一样的粗粮,干一样的农活。不论是解放战争时期,跟着中央土改工作团参加土地改革工作,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工厂任党委副书记,毛岸英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和普通群众打成一片。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新婚不久的毛岸英请求入朝参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秘书。他工作积极,认真负责,迅速熟悉了机关业务。11月25日上午,美国空军4架野马式战斗轰炸机突然飞临位于朝鲜平安北道大榆洞的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8岁。

消息传回国内,毛泽东强忍丧子之痛,缓缓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这是毛泽东一家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第六位亲人。

(据《人民日报》)

拾遗

“飞毛腿”不是指有毛的腿

中国民间把跑得飞快的人称为“飞毛腿”,还把苏联的一种导弹称作“飞毛腿导弹”,取其速度极快之意。“飞毛腿”这个称呼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飞毛腿”一词来源于古代中国的邮驿制度。邮驿制度是现代邮政的前身,起源很早,不过到了秦代才以律令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形成了最早的邮驿法。汉承秦制,统一名称叫“邮驿”。邮驿在先秦时期也叫“置邮”,置、邮、驿三个字都是传送文书的意思,用人步行传递叫“邮”,用马传递叫“置”,传送文书期间休息的地方叫“驿”。邮驿制度只限于传达官方的文书或者军事情报。官府选用一些善于奔跑的人来作“邮人”,这些人被称作“健步”,后来也称作“急脚子”或“快行子”,类似于现在的快递员,不过,现代的快递员最不济也要骑一辆电动车,古时候的“健步”们可完全是凭两条腿。

紧急的军事文书,要在上面插一根鸟羽,叫做“羽檄”。羽檄也叫羽书,不过到了宋代就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了。到了清代,军事文书上又重新开始插鸟羽以示紧急。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讲述了曾国藩的一则有趣的传闻:“曾文正公顾德重望,传烈丰功,震于一时。顾性畏鸡毛,遇有插羽之文,皆不敢手拆。”由此可见,那时的“羽檄”上面插的是鸡毛!这就是“鸡毛信”的前身。(据《天津日报》)

废名的自负

1931年,废名进入北京大学国文系,与钱玄同、傅斯年并称北大“三大魔”。

废名是极富艺术个性的作家。他的小说《竹林的故事》《莫须有先生传》《桥》等,“以冲淡为外衣”,以文化为内核,被誉为“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奠基之作”。

废名非常自负,常常语出惊人。有一次,他给大一学生讲鲁迅的《狂人日记》,开篇便说:“我对《狂人日记》的理解,比鲁迅先生自己都深刻。”如此直截了当,令学生愕然。

当时,北大的国文课要求学生每月写一篇作文,交由老师批改、当堂讲评、发还给学生。废名先点评汤一介的作文,说:“你的文章像下雨的雨点,东一点西一点,乱七八糟!”随即,又表扬一位女同学的文章:“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像我的文章,不仅形似,而且神似,优美、简练、清新。”

过了几天,废名要讲写作中的炼句,直接就举自己小说《桥》中的句子:炎热的夏日,两个女孩在烈日下走了很长的路,忽然“走近杨柳,仿佛再也不能往前一步。大树不过一把伞,画影为地,日头争不入”。废名自负地说:“‘日头争不入’真是神来之笔啊!写文章就要写出这样的句子,才叫大手笔……”说罢,满面得意之色。(据《人民政协报》)

郁达夫酒桌上套取日军情报

1941年,郁达夫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当编辑,他撰写的大量抗日题材文章成为南洋抗日文学的一面旗帜。日军攻占新加坡后,郁达夫被通缉,不得不离开新加坡,来到印尼的苏门答腊。在印尼,郁达夫化名赵康。在当地一位爱国华侨的帮助下,开了一家“赵豫记酒厂”,生活稳定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虽然被日军攻占,但抗日宣传却不比任何一个地方差。特别是转入地下的刊物,发行量大,影响力也大,尤其是每一期刊物中的插图,拍的都是日军醉酒后的种种丑态,人们翻看后哈哈大笑的同时,更增强了抗日胜利的信心。

这些图片都是哪里来的呢?原来,郁达夫到了苏门答腊后,先是利用翻译的身份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后又以酒厂老板的身份继续从事抗日活动。他特别在酒厂里打造了“双清”品牌高度酒,酿到了60度。然后,每周变着花样请宪兵喝酒。酒的度数高,宪兵一喝就醉。而每一次喝酒,他都给自己备好水应付,然后趁宪兵酩酊大醉,离开他们的酒厂后,跟在后面偷拍他们的丑态。

据说,当时日军宪兵队长是一个出了名的大酒鬼,郁达夫为了开展工作,不断地给他送酒,搞得他认为苏门答腊只有郁达夫一个人可信。而郁达夫在岛上越来越吃得开,总是在酒桌上解决许多事。程嘉庚、胡愈之、王任叔等著名人物,都是在他的巧妙掩护下脱险的,他还将酒桌上套来的情报通过地下组织传递出去。(据《天津日报》)

中国是最早用文字记录桃的国家

黄桃走红 桃呢?

中国桃成了“波斯苹果”

据《韩非子·外储说》记载,鲁哀公曾赐孔子桃和黍子(即大米),孔子先吃了黍子饭,再吃桃,旁人皆笑。鲁哀公说,黍子黏,可擦去桃皮上的毛,不是吃的。孔子回应:黍子是五谷之首,祭祀时放最前,桃在祭祀六果中排最后,不入宗庙。用高贵的东西擦擦低贱的东西,有害礼仪,我不敢做。

可见,当时桃子多毛,近于野桃。

传说东汉刘歆所著的《西京杂记》(一说东晋葛洪著)中,称汉武帝的上林苑中有“秦桃、橪(音相似,山野桃)桃、细核桃、金城(今兰州)桃、筠叶桃、紫文桃、霜桃、胡桃、樱桃、含桃(樱桃的一种)”,古人分类淆乱,仅前7个是桃子品种,其中细核桃是最早的黄桃,又称细桃,所谓“细桃红浅柳褪黄”,应是撒马尔罕金桃的祖先。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远征,经伊苏斯之战、高加米拉战役,吉达斯普河战役,占领波斯,在那里发现了从丝绸之路传入的中国桃,便把它介绍给希腊人。在拉丁文中,桃子被称为“波斯的礼物”,正如中国杏传入亚美尼亚,又传入欧洲,被拉丁文称为“亚美尼亚李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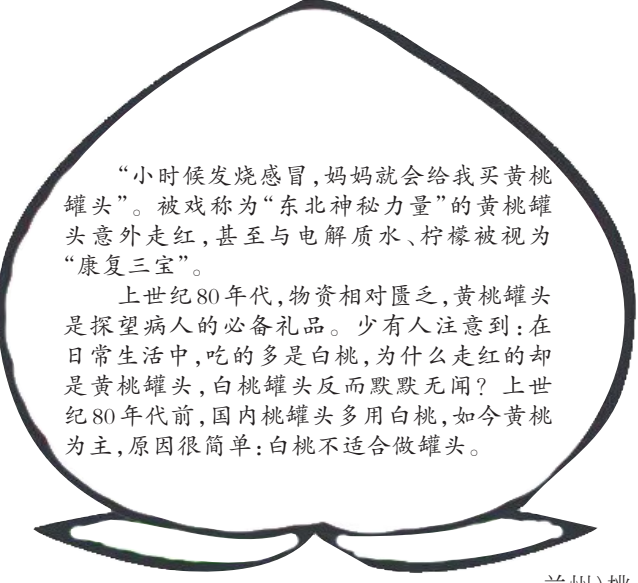
前50年左右,罗马人也开始种桃,称它为“波斯苹果”,此名在西方通用。没见过野桃,所以直到今天,仍有很多西方人误以为桃子和油桃是两种植物。



民国上海泰丰食品罐头公司广告。



黄桃罐头。(资料图片)



桃子的历史已有260万年

桃是中国独有果树,证据有三:

其一,2009年,学者周浙昆、苏涛团队在西双版纳发现距今260万年的桃核化石,与现代桃核接近,命名为“昆明桃”。此前发现的最古桃核也在中国,距今8000年。2014年,学者在浙江发现的古桃核竟是人工驯化种,距今7500年。在浙江河姆渡、河南郑州二里岗等遗址中,都发现了桃核。

其二,除了中国,世界各地均不见野生毛桃。

其三,中国桃的DNA多样性远高于其他国家。

中国还是最早用文字记录桃的国家。《诗经》中有“园有桃,其实之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投我以桃,报之以琼瑶”等句;《礼记》将桃列入祀神五果(此外是李、梅、杏、枣);《黄帝内经》也把桃列为养生五果,即枣甘、李酸、栗咸、杏苦、桃辛(桃性热,多食易上火,故称辛)。

1974年,学者们在商代墓中发现2枚桃核和6枚桃仁,是人工驯化种,仅略大于野桃。奇怪的是,甲骨文中有杏字、无桃字,可能当时桃的大小、滋味近杏,古人莫辨。公元前1世纪,中文史料已记录如何优选桃种;公元1世纪,已有密植记载;6世纪中叶,中国农民已用焚烧秸秆或粪肥来防霜冻,并用火把防虫害……均早于其他国家。